

鲁迅的世界和世界的鲁迅

——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

杨剑龙, 等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中图分类号: I210.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76(2006)06-0001-05

杨剑龙: 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 也是鲁迅诞辰125周年, 国内外都有一些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活动。鲁迅及其作品已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遗产, 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除了中国大陆, 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都有一些有影响的鲁迅研究学者与成果。今天我们来讨论鲁迅, 作为对于鲁迅的一种纪念。大家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与研究著作, 我们是否可以就如下几方面展开讨论: 我心目中的鲁迅; 鲁迅的精神世界; 鲁迅的世界性意义; 鲁迅研究的拓展。大家可以直抒己见畅所欲言。

一、我心目中的鲁迅及其精神世界

朱品君: 作为文化巨匠, 鲁迅影响了几代人。对于他, 有的爱戴, 有的疏离, 有的利用, 有的批判。鲁迅对读者是坦诚的, 他的作品常常是赤裸裸地剖露其灵魂。叶公超说鲁迅是“能怒, 能骂, 能嘲笑, 能感慨, 而且还能忏悔、自责, 当众隐讳的暴露自己”(转引自 旷新年《沉默的声音》, 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 人与神》, 中国工人出版社, 第46页), 这评价恰如其分。人最难面对的是自己, 能像鲁迅那样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 难得。谈到创作, 当今一些作家常常侃侃而谈创作经验与技巧。鲁迅却说: “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此外的准备, 一点也没有。”(《鲁迅杂文全集》第482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 这样坦诚, 让人肃然起敬。

赵春: 鲁迅在我眼中是启蒙者、旧社会批判者、写实主义作家。鲁迅主要是通过创作对人性进行剖析, 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人性的观照与解剖, 是

鲁迅小说思想的核心, 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叙事的传统, 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先河, 这份未完成的启蒙成为民族文化种种悲剧或闹剧的某种宿命。

刘昕: 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 鲁迅始终都是以刻板、阴冷以及民族苦难承受者的形象出现。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不喜爱以至于有些讨厌, 却仍怀着崇敬之情, 把他看成遥远、黑暗日子里执笔而战所向披靡的英雄。那时的鲁迅是神, 是民族魂, 唯独少了点人性与人气。

李亮: 历史上的鲁迅, 曾经一再被人“毁容”, 在阶级斗争视阈中, 鲁迅仅仅作为阶级斗争伟大战士的形象出现, 忽略甚至阉割鲁迅作为个体生动丰富的方面, 在神化与圣化鲁迅的过程中, 鲁迅仅仅成为了一个政治符码。长期以来, 权力话语的集中单一化, 使鲁迅成了政治话语的形象代言人, 成了金刚怒目式的“神”。20世纪80年代以后, 鲁迅的阐释渐渐趋于多元化, 90年代到新世纪初, 后现代与解构之风的盛行, 又有时使鲁迅变成被人颠覆、嘲骂的对象。

刘昕: 就我个人而言, 当读到鲁迅的《两地书》、《野草》这些作品时, 感到的是一种震惊, 是那种鲁迅由“神”回落到“人”的强烈反差。从那些篇章中, 我看到孝子、慈父的鲁迅, 那种为家庭亲情奔忙、无情未必真豪杰的亲切, 那种陷于自身矛盾、家庭琐事无法摆脱的焦虑, 从这个角度看, 鲁迅是一个人, 一个既平常又深刻的人。

收稿日期: 2006-06-22

作者简介: 杨剑龙(1952-), 男, 上海人,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研究; 李亮、刘昕、陈卫炉、朱品君、赵春、张勤、章莹,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李亮: 的确, 过去我们更多注意鲁迅绝望抗争阳刚的一面, 鲁迅还有柔情的另一面, 作为母之子、妻之夫、子之父, 他承担着责任, 表现出温爱; 承受旧式婚姻时的愤懑苦痛, 面对爱情时的犹豫不决, 为金钱所困的奔波苦恼, 对“鬼气”缠身难以摆脱的困惑, 既远离名利又怕被别人冷落的矛盾, 等等。他是中国社会最为独特的知识分子, 他敢于直面现实、反省自我, 但身上仍留存着中国传统文人之气, 造成他只能常常带着面具, 独自承受内心的痛苦与磨难, 独自咀嚼着人生的苦闷与悲哀。

朱品君: 人无完人, 鲁迅当然也不例外, 他多疑、易怒, 所以树敌颇多。多疑的性格使他往往把人与事看得过坏, 使得他的内心更显得寂寞与荒凉, 从而走向虚无主义, 《过客》集中表达了鲁迅对于绝望与虚无的富有个人特色的选择。

杨剑龙: 其实《过客》更多的是一种执著探求的精神, 那种无论前面是花还是坟, 过客仍然执著前行, 其实这也是鲁迅自身精神的某种写照。鲁迅不是虚无主义者, 他时有虚无感, 时有寂寞与无奈, 但他仍然进行着绝望的抗争。

刘昕: 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 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 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 人倒霉了, 陷入生命的困境, 充满了困惑, 甚至感到绝望, 这时就走近鲁迅了。困惑与绝望必须有一定的生活积淀才有可能出现。

陈卫炉: 阅读鲁迅跟自身阅历和心态情绪有关。在我们的时代, “一说崇高就有人说你虚伪, 一说悲悯情怀就有人说你矫情, 一说风雅就有人说你附庸风雅”, 谈论鲁迅需要勇气, 一味地将鲁迅妖魔化或神圣化, 不结合鲁迅自身实际, 对鲁迅思想的了解与研究都于事无补。

李亮: 鲁迅生前知音难觅, 而其仙逝后, 一些所谓的徒子徒孙们却争先恐后地宣称, 自己是唯一深得鲁迅衣钵的人! 在“鲁学”的山头上, 一些人树旗称王, 又有些人想把鲁迅拉下神坛, 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杨剑龙: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神化、圣化鲁迅, 将鲁迅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仍然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的,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作为学术研究, 对于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不能光仰视, 要平视, 甚至还要俯视。如果只是仰视, 只能看到他高高在上的一面; 采取平视的角度, 我们就能够客观地进行研究; 采取俯视的角度, 我们就可以有一种鸟瞰的眼光、历史的观照,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把鲁迅放在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

学史轨迹上去分析, 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 他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对待历史人物要从多方面来研究, 包括鲁迅, 他身上也有短处, 并非完人。既要鲁迅看作一个伟人, 更要看成一个凡人, 他也有七情六欲, 也有些短处, 如多疑。但我们也要把“多疑”放在鲁迅所处的整个时代来看。首先是因为他少年时代家庭的变故, 小小年纪, 出了药铺进当铺, 受了很多欺凌, 遭了许多白眼, 造成他对社会的多疑态度。鲁迅对他的故乡是看透的, 他常常用冷漠的眼光去看世界, 他的作品展示的也是一个冷漠的世界, 但鲁迅要启蒙, 他从启蒙的角度揭示冷漠世界的病态。我们阅读鲁迅, 研究鲁迅, 既要鲁迅看成一个伟人, 又要把他看成一个常人; 既要仰视, 也要俯视。这样才能不把一个巨匠神化, 也不贬低。有段时期, 人们拼命去找鲁迅的短处, 找他的艳闻佚事, 来制造轰动效应, 这是不正常的。

赵春: 鲁迅当年曾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任教, 跟“欧美派”的矛盾更多是一种派系之争。鲁迅曾跟陈源打过笔仗, 拒不接受陈源对他“某籍某系”的指控, 这里的“某籍某系”指的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浙籍人氏把持北大之事。鲁迅并非是由“某籍某系”而发迹, 但事实上确实因之而得益。

杨剑龙: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如果把浙籍的作家抽掉了就会至少少了一小半。以前我们总把文学看得很崇高, 而忽略了文学有时也是谋生的手段, 当时搞文学也是求生活, 如同宁波人跑码头做布生意, 扬州人做剃头刀、扦脚刀、切菜刀的生意一样。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 有了话语权, 就可以录用提拔同乡,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 江浙地区本身的文化传统与积淀, 培养出了一批有文学功力的学者文人, 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由求生活走上文人之路, 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赵春: 鲁迅从小接受严格的古文教育, 这对他选择新的知识特别是医学和自然科学有一定作用。传统中国以文治国, 理工科薄弱, 传统尚文精神和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很大程度限制了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纳。

杨剑龙: 辛亥革命后, 鲁迅有一段钞古碑读古书的岁月, 这对于鲁迅深入了解与研究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深入肯綮、鞭辟入里的分析, 离不开这段时期的阅读。我们也不要忽视鲁迅很喜欢读野史笔记, 这对鲁迅的影响也不小。

刘昕: 那时很多学人早期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 但在十几岁走出家乡、或者出国留学

后,都进入现代西式学校学习,这给予他们接受新知识的途径,很多人是站在这个角度去批判传统文化的。

李亮:鲁迅这一代留学日本的和留学英美的文化人,在文学观点、思想观念上有所不同。

张勳:鲁迅受尼采影响很大。他从日本学的是二手尼采,并不是从欧美学一手的,但他学得更为正宗,这跟日本当时的语境有关,与鲁迅本人个性也有关。

杨剑龙:鲁迅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来接受西方文化的,他绝不盲从,他是了解、理解后再作判断。他是从异域盗来火种煮自己的肉,这是他与有些中国文人最大的不同,他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把自己放进去批判,他与周作人的不同最主要也在于这点,周作人常常是以旁观视角观照社会的。鲁迅写人力车夫,不像其他“五四”作家那样坐在车上感叹:人力车夫苦啊!鲁迅他会从车上下来,承认自己的“小”,仰视车夫的高大。这与鲁迅的身世有关,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病了由他来扛起家庭的责任,家庭变故和父亲死后他饱受欺凌,于是他对封建家族有了很深的感受。辛亥革命后,经过读古书、钞古碑的时期,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有了这一寂寞时期,他才写出《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发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其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就是“从来如此,就对么?”表现出“五四”精神中最重要的怀疑精神。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了解中国文化,也接受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的融会中来看待和批判传统。

章莹:抛开加在鲁迅名字前的种种头衔,只把他当作普通作家来阅读时,最打动我的是其作品中的“客子”形象。家庭的变故、离乡的痛苦等原因,使他的作品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游子的情怀。当他回到故乡后,却发现这里已经不是那个梦中所怀念的故乡,且更难以亲近,有种在故乡做客的“客子”感觉,便不得不再次离开。《酒楼上》、《故乡》所描写的“我”的经历,也许就是作者彷徨迷惘中在故乡却如客子的真实写照。“客子”形象是鲁迅所塑造的众多艺术形象中的一个重要剪影。

杨剑龙:鲁迅作品中的归乡者确实是一种“客子”形象,但是他回到的故乡已经不是原来的故乡了,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归乡者所见的故乡是停滞的、落魄的、封闭的。这种感情跟他走出去时的感情完全不一样,他想去寻故乡、寻旧梦,但却已难以找到了,这种隔膜和疏离造成了游子的无根状态。所以,在鲁迅小说中,归乡者始终是被故乡所放逐

的,回到故乡的他注定了只不过是一个客。从某种角度上说,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或者说是两种文明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故乡代表着一种封建式的农业文明,他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用这种眼光去看故乡,落魄的故乡已不是他心目中的故乡了。在故乡,归乡者很孤独,过去的挚友都已星散,朋友都在为杂事忙碌,他只有到那酒店去吃记忆中的菜。鲁迅小说中形成了一个叙事的模式:回乡——隔膜——离乡。

赵春: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较,鲁迅看问题更为犀利、批判更为深刻。他早年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推崇19世纪自然科学理性的精神,认为“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从而“俯首甘为孺子牛”般地提携后进,可是青年人是如何报答他的呢?

杨剑龙:鲁迅对待青年们是很真诚的,他一生给许多青年作者改稿、写序、回信。即使有青年作者忘恩负义地攻击他,他仍然执著地努力为下一代开路。虽然这跟他的进化论思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鲁迅认为这启蒙的事业要有延续性。鲁迅是个复杂的个体,也是个丰富的个体。我们说,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20世纪最痛苦的思想者,他在思考社会、人生以及未来,他一生都在思考如何改变这个社会,他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启蒙民众,但社会却日趋黑暗,民众又不听呼唤,他倍感孤独;他想给年轻人引路,又怕带上歧途。鲁迅始终都有这样的担忧,他不想做人们的导师,但作为一个思想者和文学大家,青年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导师。鲁迅始终坚持着这样的志向:救中国,救民众,改变社会,改变人生,改变国民性。鲁迅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不断地痛苦,不断地焦虑,不断地绝望,但仍然进行着绝望的抗争。

二、鲁迅的世界性意义

朱品君:现在,“鲁学”不仅在中国是门“显学”,同时也走向了世界。我认为鲁迅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帮助人们解除精神枷锁。鲁迅批判国民性中的奴性,强调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鲁迅至死“一个都不宽恕”的斗争性,在当今弱肉强食的年代也具有世界性意义。现代知识精英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必须具有鲁迅的批判精神,知识分子失去了这种精神就消弭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从某种角度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他常常几乎是以个人的力量批判社会、反抗社会,鲁迅精神对当前一些有着骑墙性格的“社会精英”,至少具有一种警示意义。

张勳:我们在考虑鲁迅的世界性意义时,视野要进一步放宽,比如《阿Q正传》中,一直关注“精神胜

利法”、国民性的批判,但在世界背景下,是否还需要换角度重新解读,这是值得思考的。

陈卫炉:鲁迅世界性意义应该放置于近代中国已被强行纳入世界整体体系的框架中来讨论。以鲁迅为重要成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西方思想和文化催生的结果,“五四”一代一开始就自觉地以西方代表的现代性作为反叛旧传统、获取文化运动合法性的资源。可以说,活动于这一背景的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先天地属于世界整体的一部分,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世界性意义的可能。问题在于,作为中国话语系统的一个“谬种”的鲁迅的独特生命存在样式,他怎样以自己的“这一个”丰富世界文学和人类思想的多样性特征,为整体的人类生存提供一种美好的可能性?就他的作品而言,《狂人日记》有着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影子,《药》闪动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鲁迅式的“拿来主义”,使得“五四”一代否定中国旧传统时包含了肯定西方的因素。鲁迅及其缔造的文学世界为我们探求鲁迅的世界性意义提供了可能,当下学术界(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流行以鲁迅为个案,在殖民地社会背景下,反思民族“现代化”的研究。这个视角的开创赋予了鲁迅研究的时代性内涵和现实性意义。

赵春:鲁迅的意义告诉我们,须有独立的个体,才能拥有独立的民族;须有自由的禀性,才有理性的思索;须有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才能理解宽容和自由的精义;须有“拿来”的气魄,才有面向世界的可能。

李亮:在“鲁迅的世界性意义”这个命题中,“鲁迅”不仅是作为生命个体来理解,更多指涉着一个价值符号,即意义的相通性或指代性。日本形成了“竹内好鲁迅”、“丸山升鲁迅”等,更多地探求民族的反思性;韩国则从鲁迅上吸取反叛性,关注殖民地背景中的鲁迅。鲁迅身上最为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特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姿态。鲁迅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独立身份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社会参与意识的公共良知,鲁迅用社会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所拥有的广泛影响力,以启蒙者的身份对大众进行由上而下的启蒙,呼唤国民自由个体的产生。他并不装扮成大众的精神领导,且一再拒绝被人当成“导师”,表现出许多对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反省性的思考。鲁迅的道德实践和理性反思,对当前知识分子纷纷被商业体制、知识体制、国家体制招安,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技术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中出现的犬儒主义、伪崇高、伪精英等,这些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窘态也都不

无借鉴意义。

当前,社会信仰缺失、道德失范,娱乐恶搞现象盛行,东方和西方都面临着自身的定位难题。其中有几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指责“五四”割裂传统,从而呼唤回归儒学,为新保守主义立言;二是一味追逐“西方”,拾人牙慧。鲁迅认为,定位要有“心里的尺”,做到“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在是”(《文化偏至论》,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53-54页,1981年版)。反对“伪士”,做到“白心”。否则以西方为模板,抛弃传统,最终会成为可怜巴巴的“飞地”。

三、鲁迅研究的拓展

刘昕:我们解读鲁迅时始终都有一种无形的障碍:鲁迅是被意识形态渲染过的、体制化的鲁迅,鲁迅在面向大众时是没有独立价值的,他被一种普遍性重新定义过了,这种普遍性几乎涵盖了“五四”时期大部分的作家作品,从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站在这个阵营里就是那个阵营里,二元对立,非此即彼,阵垒分明,绝无过渡。长久以来,许多研究者都没有脱离这种简单粗暴且不实事求是的分割方法,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塑造出的鲁迅是那样冰冷与遥远。鲁迅的论争在不断继续着,人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与思考变得越来越动态化多样化,这赋予了鲁迅研究鲜明的时代需要和个人体味的色彩。近八十年的研究史表明,有许多问题仍待解决,这说明在不同时代由于整体社会思潮的转变、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的复杂作用,人们对鲁迅的理解与解读将永远不会停顿。但在现今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语境中进行技术层面上的简单化操作,往往造成新的曲解与误读,或者还是在“为社会情境和政治意识形态寻找注脚”,鲁迅就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鲁迅。

朱品君:目前“鲁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于鲁迅的研究越深入,就越会让读者触摸到真实的鲁迅。但研究也有不少问题。有人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来分析萧红对鲁迅的“恋父情结”,考证鲁迅与许广平定情发生性关系系何年何月何地,考证鲁迅是否狎妓,即使资料再详细,考证再深入,又有何益?

陈卫炉:目前鲁迅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圣化鲁迅的传统;二、解构鲁迅的努力;三、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时代困惑。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追求一种单一的全能阐释体系,毫无批判地继承了革命领袖对文学领袖的经典论述,并且习惯性地把它当作解读“鲁迅”这一蕴涵无限丰富性、复杂性独特个体

的唯一法则,这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以论述论证权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正确性乃至真理性的路途,从而主动放弃了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科学认知的努力,窒息了科研的生命活力。与圣化鲁迅相对应,近年以来,学术界的“世纪末的鲁迅之争”,存在着诸如“拉鲁迅下水”、“还原真实的鲁迅”的解构式努力,这与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努力只是多从政治与文学的角度入手,剔除的只是覆盖在鲁迅身上“至圣先师”的意识形态保护色,而没有真正零距离接触本体论意义上的鲁迅。有学者早就提出,鲁迅的研究存在从“中兴”到“末路”的危险。为此,重温“跳出先定前提”(汪晖)和“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王富仁)的口号,仍旧具有重大指导性意义。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入历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正确地去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伽达默尔)。只有这样,无论是摆脱“既定前提”还是“回到鲁迅那里去”,才有可能真切地接近鲁迅、还原鲁迅。

李亮:鲁迅研究在拓展的同时,还要回归“常识”。在研究上,不仅仅是“我注六经”,也要“六经注我”,考虑到鲁迅跟当前时代的结合点,得出最大社会价值。

杨剑龙:现在中国吃鲁迅饭的不少,鲁迅在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亚洲鲁迅研究已经确立起来了,像日本、韩国对鲁迅都研究,做学位论文的很多,包括新加坡,鲁迅其实也在走向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研究鲁迅的也很多,至少鲁迅的精神遗产是世

界性的精神遗产,这个是肯定的。我觉得鲁迅精神总体上是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救国救民为主的一种精神,至少是一种民族的焦虑。中国落后,鲁迅寻找到摆脱落后最根本的方法是“立人”。他觉得中国人还没有立起来,中国人是没有个体的人,中国社会从来都是奴性社会,所以鲁迅对中国社会批判最深刻的是奴性,所以“大写的人”是与“奴性”对立起来的。鲁迅说,中国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渴望有第三种时代。但他还有一个就是怀疑——“从来如此就对吗?”在怀疑的基础上,建构鲁迅的批判精神,包括批判自我,包括批判社会。所以,我觉得,这就构成了鲁迅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现实的批判。从某种角度说,鲁迅的批判是深刻,有些人说是尖刻,这是鲁迅的价值和意义。鲁迅当年批判过、揭露的丑陋现象,现代社会仍然延续着。鲁迅当年提出“立人”意识,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重要意义。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人往往被消弭在物欲里,消弭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这构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新的困境,这跟封建社会人的困境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所以,鲁迅的这种立人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人在痛苦的时候,可能更能走近鲁迅、靠拢鲁迅。现代社会有很多矛盾,虽然物质生活比过去丰富了,但是精神世界却往往陷入迷茫、困顿的状态。今天,鲁迅的精神意义仍然存在,鲁迅是说不尽的。

(整理修改:杨剑龙、李亮、刘昕)

“韩愈文化论坛”在孟州举行

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和孟州市政府主办、孟州市韩愈研究会承办的“韩愈文化论坛”活动,于2006年10月15日至18日在韩愈故里——河南省孟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韩国、日本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清华先生致开幕词,名誉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卞孝萱先生作重要讲话。开幕式和学术报告会分别由副会长杨丕祥和胡阿祥、闫琦、孙昌武主持。焦作市以及孟州市的党政领导和广东阳山、潮州的领导到会并分别致欢迎辞与贺辞。

论坛收到论文、诗词八十多篇,以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的形式,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韩愈的政治、哲学、文学、教育、军事思想及其与现代经济文化建设的关系等探赜索隐,各抒己见。闭幕式上,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闫琦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开设全国高校学报唯一的“韩愈研究”专栏,筚路蓝缕,矻矻以求,及时发表海内外最新成果,得到大家的赞扬与鼓励。

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对会员重新登记的决议》和《关于编印“会员采风”的决议》,拟定下次“韩愈研讨会”2008年秋在孟州市召开。